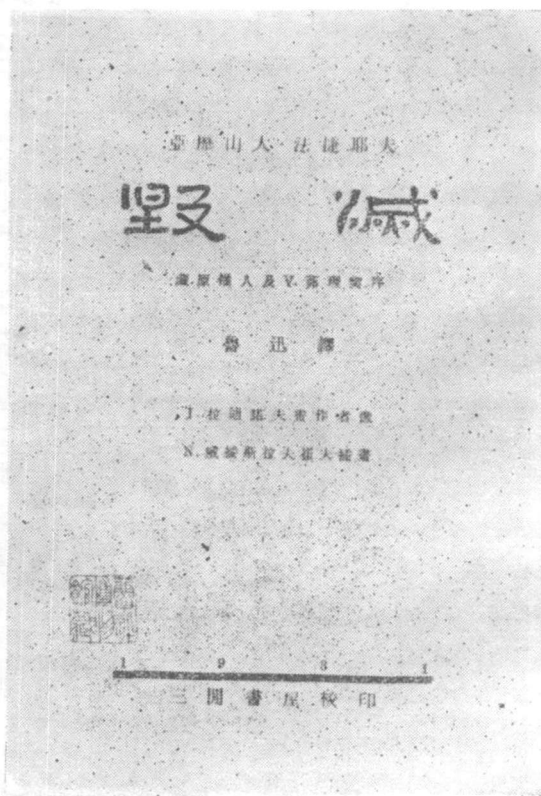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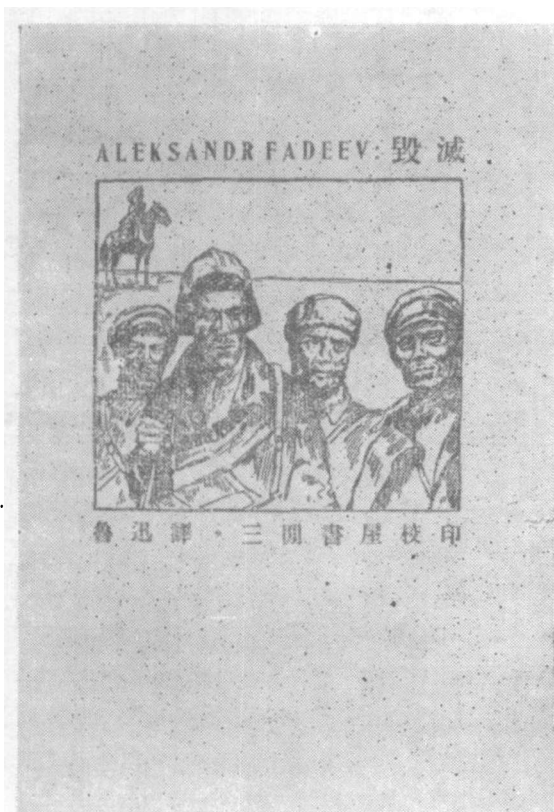


呕心沥血播芳馨

——漫话鲁迅与《毁灭》的翻译及出版

张小鼎

(北京鲁迅博物馆)



1931年，当《毁灭》中译本出版后不久，鲁迅于12月28日在给亲密的战友瞿秋白信中曾无限深情地说，自己对于《毁灭》中译本“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关于翻译的通信》）爱“书”竟然如同爱“子”，这在今天的一般读者看来，不但稍感费解，或许还会感到些微诧异的。可是，假如我们了解在那荆天棘地、腥风血雨的三十年代初期，鲁迅是怀着如何崇高的革命意愿，以锲而不舍的顽强毅

力，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历尽了种种艰难险阻，才将描写十月革命时期的优秀作品《毁灭》，翻译介绍到中国，使之出版，广为流传；那么，对鲁迅上述寓意深长的话语我们不仅可以完全理解，而且对共产主义者鲁迅那种呕心沥血、传播芳馨的崇高品德，将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深深的敬意！

〈一〉

《毁灭》的作者是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

夫(1901—1956)，他于1918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9—1920年参加过远东地区游击队，跟白匪高尔察克和日本干涉军作战。长篇小说《毁灭》即取材于这段亲身经历的生活。作品描写1919年夏秋之间，以布尔什维克莱奋生为首的一支一百五十人的游击队，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匪军的包围、追击下，顽强战斗，奋力突围，经过生死搏斗，历尽艰苦考验，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虽然最后他们只剩下十九人，但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小说写于1925—1926年，1927年出版后，很快引起苏联文学界的重视。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认为作者“非常有才华地提供了国内战争的广阔的、真实的画面”。《毁灭》被誉为反映苏联国内战争的最优秀作品之一，是早期苏联文学的典范。

鲁迅从日译本看到该书后，深为赞赏，认为“非身历战斗的战士”无法写出这种“纪念碑的小说”；并于1929年即着手转译。这年年底，鲁迅与冯雪峰等合议创办《萌芽》月刊，该刊是以发表、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为主的著名刊物。1930年元旦，《萌芽》月刊创刊时，鲁迅就开始连载由日译本转译的长篇小说《毁灭》；其后，呕尽心血，几经周折，历时两年，直到1931年完整的单行本《毁灭》才得以诞生问世。

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鲁迅为什么要冒着莫大的政治风险，翻译介绍这部苏联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呢？

我们知道，对于俄国和苏联的进步文学，鲁迅一向十分重视。他曾先后选译过迦尔询、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费定、理定、富尔曼诺夫……等三十多位作家的作品。鲁迅现在又亲自动手，非常及时地挑选《毁灭》来翻译，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有着明确政治目的和深刻用意的。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方面，从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

始，到1930年时，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分布在江西、湖南、安徽等省，建立了中央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等十多个主要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为此而坐卧不宁、惊恐万状。自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蒋介石调兵遣将，亲自督战，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与军事“围剿”相配合，反动派在白区加紧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在指使资产阶级反动御用文人对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发起进攻同时，还肆意封闭社团、捣毁书店、查禁刊物、递匿名恐吓信，乃至逮捕作家、秘密杀害……。例如：

1930年3月19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曾以“堕落文人”罪，呈请伪中央通缉鲁迅；

1930年9月30日，国民党秘书长、CC特务头子陈立夫签发“取缔”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等组织的反动命令；

1930年12月，颁布《国民政府之出版法》44条，加强反革命的言论控制；

1931年1月17日，柔石、殷夫等“左联”五位青年作家，与其他共约三十多位同志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

1931年2月7日，“左联”五位革命作家与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1931年9月，进一步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查禁了228种书刊。

面对严酷的现实斗争和敌人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鲁迅坚定认为将反映苏联国内战争的优秀作品《毁灭》，及时介绍过来，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更为紧要”的。因为《毁灭》是“讲战斗的”佳作，是真正描写现实的民众的作品，倘若《毁灭》能够翻

译和出版，对于粉碎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无疑会起到有力的鼓舞作用，产生积极的影响。应该说，这是鲁迅的主要意图。

与此同时，他决心翻译《毁灭》的另一层用意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原来，鲁迅对当时颇为流行的“革命加恋爱”一类公式化的缺乏生活的“革命文学”作品是深为不满的。早在1929年4月，他在给当时的青年作家李霁野的信中就曾写道：“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介绍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因此，引玉借鉴，为健康地发展革命文艺创作，提供一个典型和样板，原也是鲁迅不遗余力地尽快翻译和出版《毁灭》的重要目的之一。

(二)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当年鲁迅“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的中译本《毁灭》，是经过怎样阵阵的“腹痛”和意想不到的“难产”而降临中国大地的罢！

1930年1月1日，由鲁迅主编，光华书局发行的进步刊物《萌芽》第1卷第1期在上海创刊了。鲁迅据藏原惟人日译本转译的《毁灭》译文，首先在《萌芽》上开始连载，题作《溃灭》，署名鲁迅。为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该书作者，本期还刊登了亦还译的《A·法克耶夫底自传》并法克耶夫像一帧。在刊物的《编者附记》里还对作品的内容作了扼要介绍，对作者高超的描写手法尤加推崇，称赞《毁灭》是“立在现代苏联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底最高峰”的艺术作品。从此，每期刊载一段译文，颇受好评，被“读者赞为佳作”。可是好景不常，刊载至第五期即被迫中断。

原来，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萌芽》从第三期起成为“左联”刊物

之一，不仅篇幅有所扩充，而且内容也与以前计划略有更易。特别是第三期为“三月纪念号”，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第五期为“五月各节纪念号”，纪念“五一”和“五卅”。国民党反动派本来就该刊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此时正好作为借口，勒令《萌芽》停刊。由于第六期已经集稿，作为抵抗手段，鲁迅决定将《萌芽》改为《新地》月刊于1930年6月出版，并继续刊载《毁灭》译文。结果，自然为反动派所不容，仅出一期，就又被查禁。《毁灭》全书原本是三部，由于刊物只出了六期，所以《毁灭》的中译仅连载了一、二两部就被腰斩了。

也还是1930年的上半年，当左翼文学盛兴而又未遭受反动派的残酷压迫时，许多书店为赶时髦，都愿印几本内容左倾的革命文学书籍，以显示自己的前进。这一种风气，居然也打动了一向以出版碑帖书画为主的《神州国光社》。该社1908年创办于上海，1929年陈铭枢接办后，进行了改组，由王礼锡任总编辑，出版一些社会科学及新文艺书笈。这时鲁迅便应《神州国光社》之请，为他们编辑一套翻译新俄作品的丛书。其中拟收的重要作品，除法捷耶夫的《毁灭》外，还有富曼诺夫的《叛乱》，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等十种“世界上早有定评的”小说和剧本，名之为《现代文艺丛书》。翻开《鲁迅日记》，1930年4月有这样一条记载：“十一日晷。……下午雪峰来并交为神州国光社编译《现代文艺丛书》合同一纸”，即指此事而言。合同既订，鲁迅就积极筹划约好柔石，冯雪峰、曹靖华等人分别承译，并公开发表了丛书的目录。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一天天加重，书店非常骇怕；神州国光社也赶来声明毁约：已经交去的译稿当然收下，尚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万勿再译了。因此，这套著名的丛书仅出了《浮士德与城》（A·卢那卡尔斯著作，柔石译）、《十月》（A·雅各武莱

夫作，鲁迅译）、《铁甲列车》（V·伊凡诺夫作，侍桁译）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贺非译，只出了一册）等四种作品而夭折。这样，尚未译完的《毁灭》就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了。鲁迅后来曾意味深长地说：“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铁流》编校后记）

然而，鲁迅是善于锲而不舍地进行韧性战斗的。由于怀抱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信念，鲁迅在十分艰难的环境里，非常严肃认真地坚持将《毁灭》全部译完，这在地的日记中也有明确记录。1930年12月26日那天是这样写的：“……夜译《溃灭》讫。小雨”。第二年的5月13日又写有：“……夜重复整理译本《毁灭》讫。”两则日记加在一起，虽仅寥寥十数字，却反映出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两个“夜”字说明鲁迅译时，每每灯下埋头伏案，工作到万籁俱寂的深夜；“重复整理”体现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译作态度；时间相隔四月之久，表明《毁灭》中译从初稿到定稿，鲁迅所付旷日持久的艰巨劳动；书名由《溃灭》改为《毁灭》，正是无数的心血之花，结出的灿烂之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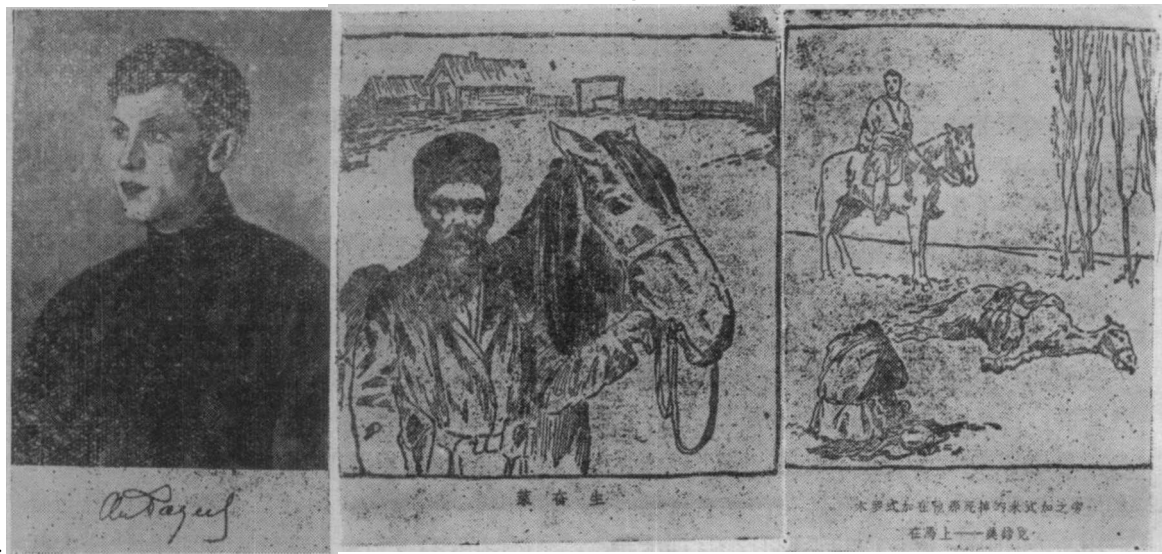
鲁迅所译《毁灭》主要以藏原惟人的日译本为底本，参照英德两种译本重译。这在《〈毁灭〉后记》中曾有清楚的交代：这一本书，原名“Razgrom”，义云“破灭”，或“溃散”藏原惟人译成日文，题为《坏灭》，我在春初译载《萌芽》上面，改称《溃灭》的，所据就是这一本；后来得到R、D、Charquas的英文译本和Verlag-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出版的德文译本，又参校了一遍，并将因为《萌芽》停版，放下未译的第三部补完。后二种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内容，则德日两译，几乎相同，而英译本却多独异之处，三占从二，所以就很少采用了。”

经过十月怀胎，《毁灭》中译总算完成，现在该是寻找分娩的医院了。可是，在当年进步书刊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密的上海，哪里去寻觅一个可以容许《毁灭》诞生的产院呵！

毕竟天无绝人之路，接受中译本《毁灭》的产院终于找到一家，那就是大江书铺。此书铺系由陈望道、汪馥香于1927年创办于上海，出版刊物有《大江月刊》、《文艺研究》等。陈望道同志是我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的译者，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与鲁迅有着友好交往。1929至1930年间他任大江书铺编辑时，曾约请鲁迅翻译苏联卢那卡斯基的美学论著《艺术论》，于1929年6月由大江书铺出版；因此鲁迅与该书铺总算有点特殊的老关系了。

由于白色恐怖日益加重，书铺为避免当局的迫害、查禁，《毁灭》出版时不仅略去了《作者自传》、《关于〈毁灭〉》、《代序》及《译者后记》等篇，仅存本文，而且连译者的名字“鲁迅”也不敢刊印，却改用“隋洛文”的署名。为什么偏偏改此姓，换此名？原来，前面已略提及，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曾诬蔑鲁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等进步组织为思想堕落，因此呈请伪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隋洛文”这个署名正是由“堕落文人”变化（即将“堕落”二字，上下各取其半，变成“隋洛”）而来，明显地含有反讥之意。

尽管如此，《毁灭》的最早中译本终于在1931年9月30日由大江书铺出版了。全书是三部十八节，共271页，样式为28开，毛边本。书前冠以I·拉迪诺夫所作法捷耶夫画像（印为单色）一张，书内另外印有N·威绥斯拉夫崔夫关于本书的插图六幅。《毁灭》虽然在上海诞生了，但其遭遇是不幸的。在当时岩石似的政治重压下，此书只能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上海内山书店和



为数寥寥的另一些小书店里悄悄陈列、发行。尽管这样，仍被伪中央党部密令伪上海市党部，将《毁灭》严行查禁，并勒令销毁原版。《毁灭》在中国刚一出世就遭到如此厄运，的确很难广为流行，继续生存下去。

“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为了冲破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和向反动派示威抗议，当《毁灭》在书店被禁，不准发行后，鲁迅又将它改换衣着穿戴，重新设计装潢，决计从自己拮据的生活中拿出一千元现洋，于同年11月由他自己主持的三闲书屋出版。所谓“三闲书屋”，只有店名，并无店址，是鲁迅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自费出书所假托的书店名称。所印书籍均由鲁迅自编自校，且大多为当时白色恐怖统治下，上海书店老闆们所不敢承印的进步书籍和版画。例如最早以此书屋名义编印的是1931年2月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其后印行的就是《毁灭》、《铁流》、《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死魂灵百图》等。“书屋”何以题名“三闲”呢？原来1927—1929年，进步文艺界曾开展革命文学论争，鲁迅与一些革命文学倡导者有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当时有批评家错误地批评过

鲁迅的杂文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有闲阶级的东西，说鲁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闲暇”居然多至“三个”——为纪念这一桩笔战公案，鲁迅后来曾将1927—1929年这一时期所写杂文幽默地命名为《三闲集》出版；这里“书屋”冠以“三闲”头衔，也含有相似的用意。

鲁迅自费印行的《毁灭》除正文外，书前尚有《作者自传》、《著作目录》、《关于毁灭》（藏原惟人）及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V·弗理契）各一篇；书末还有译者鲁迅所作《后记》一篇，全书282页。这样，鲁迅先生为广大读者着想而费尽心血设计筹划的这个《毁灭》中译本——不仅译文忠实可靠，内容完整无缺，且附有丰富的史料——终于在久经磨难之后，如愿以偿地诞生了。

《毁灭》的装潢设计也颇考究。采用毛边本，重磅道林纸印，二十三开。封面用厚布纹纸，印有《袭击队员们》一图，此画原系N·威绥斯拉夫崔夫为本书所作的六张插图中的一幅，其余各幅亦分别插入书中。卷首另附被推为“佳作”的I·拉迪诺夫所绘法捷耶夫彩色肖像一帧；扉页书名由鲁迅亲题美术字，看去别致新颖，十分漂亮。至

于这些插图和肖像画，也都来之不易，它们都是由当年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曹靖华同志悉心搜求，千里迢迢地设法寄到鲁迅手里，以供《毁灭》中译本使用的。假如说，在当时极端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毁灭》单行本得以印行，可以算作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末，在那种简陋恶劣的物质条件下，《毁灭》的装帧设计，由于鲁迅苦心经营也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倘与当时出版界一般书籍比较，不仅是高质量高水平，而且简直犹如凤毛麟角，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珍本了。

“三闲”版《毁灭》封面的译者署名为“鲁迅”，这不仅表明了对反动派迫害作家查禁书刊的公然蔑视和抗议，而且也充分显示了鲁迅铮铮铁骨，刚健不挠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品质。

（三）

中译本《毁灭》诞生的一九三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领导工农大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英勇创建工农红军，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创业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此，中译本《毁灭》的出版，无论对中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还是对激励中华儿女奋起抗击日本侵略，无疑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起到有力的鼓舞作用。

鲁迅为了扩大《毁灭》的作用和影响，曾不断撰文向读者介绍《毁灭》的内容，宣传、阐述其意义。早在《萌芽》月刊分期连载译文的1930年2月就撰写了《〈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刊于《萌芽》1卷4期）。通过对书中三个具体事例的评述，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斗争必然要经过艰难曲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规律，非常精辟地指出“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

《毁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士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当译完《毁灭》初稿后不久，鲁迅又于1931年1月17日撰写长长的《〈毁灭〉后记》，在称赞作品为“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同时，还十分推崇作者法捷耶夫在刻画人物上的高超技巧——即采取从大众中“选出代表”来塑造典型的方法。他说：“要用三百页上下的书，来描写一百五十个真正的大众，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尽。本书作者的简炼的方法，是从中选出代表来。”在自费印行的三闲书屋版《毁灭》问世前后，仿佛渴望已久的“儿子”终于诞生在自己手中一样，鲁迅以十分激动的心情，一连亲拟了有关《毁灭》等革命书籍的三个广告：即《〈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三闲书屋校印书籍》、《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他再一次盛赞《毁灭》所写的“农民矿工以及知识阶级，皆栩栩如生，且多格言，汲之不尽，实在是新文学中的一个火炬。”

鲁迅一生曾孜孜不倦地翻译过十四个国家近百名作者的两百多种作品；而在“风沙扑面，虎狼横行”的黑暗年代里，竟如此激动地为一部翻译小说呐喊叫好，这种做法即便不是空前绝后的，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了。这些正说明鲁迅对无产阶级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是怀有多么真挚深沉的感情。为了借外国的“讲战斗”的作品的革命之火，来照明当年中国的暗夜；为了给中国劳苦大众和革命者运送精神武器，激励斗争意志，鲁迅是如何以“献身真理，牺牲一切”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进行战斗和写作啊！

“革命的爱在大众。”鲁迅的心始终是和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心相通的。考虑到革命青年和劳苦大众的经济窘迫，无力购买标价为二元二角一本的《毁灭》一书，又特意将该书发行“特价券”，以六角一本，对折出售。

他衷心地期望“特价券”四百枚，尽为没有钱的读者所得到。鲁迅对劳苦大众的体贴入微，的确是感人肺腑的。1932年秋天，他曾亲手将《毁灭》赠予素不相识的工人读者。那天，鲁迅正在内山书店与老闊谈天；一位名叫阿累的汽车售票员来到书店，当他爱不释手地翻阅《毁灭》等新书，想要购买钱又不够时，鲁迅立即走上前去热情地将书赠送给他。四年后，这位工人曾怀着深深的敬意撰文悼念鲁迅，并引以自豪地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阿累：《一面》）。

犹如将婴儿诞生的喜讯及时传送给至亲好友和一切关心其出世的人一样，鲁迅在“三闲”版《毁灭》问世后不久，即将书籍分赠给好友郁达夫及青年作家许钦文、台静农等人，1934年9月还将《毁灭》寄给地处祖国边陲，远在广西南宁军校任职难以购到此书的李天元。在与亲朋好友曹靖华、台静农等人的书信往还中常常谈及此书，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在想方设法不断扩大《毁灭》的政治影响时，还一再强调其取得的艺术成就，可供青年作家们学习借鉴。当小说译出后，鲁迅就曾意味深长地说，《毁灭》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毁灭》后记）其后，在1932年《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还以《毁灭》去对比、批判当时颇为流行的才子佳人式作品。他说《毁灭》“以铁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谈到毫无踪影。”1935年8月28日鲁迅在为年青作家肖军的《八月的乡村》一书作序时，一面热情地肯定《八月的乡村》是“很好的一部”小说；同时也含蓄地暗示作品在艺术结构上的弱点与不足：“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

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这里鲁迅委婉地示意，青年作家们应向法捷耶夫的《毁灭》的创作艺术技巧学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鲁迅对《毁灭》深远的政治影响和娴熟的艺术技巧是如何地重视与推崇倍至的！

〈四〉

当年，鲁迅译印的《毁灭》，在“上有御用诗官的施威，下有帮闲文人的助虐”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过关斩将，突破重围，来到读者大众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近似奇迹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卓越战士瞿秋白同志在获悉这一喜讯后，非常及时地于1931年12月5日用J·K署名致函鲁迅，向他表示热烈祝贺：“敬爱的同志：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接着，秋白同志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道：“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牠，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瞿秋白文集》·论翻译——给鲁迅的信）鲁迅正是在读到秋白同志的来信后，才怀着抚爱和期待的心情谈到《毁灭》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个人的行动自由受到白色恐怖的极大限制时，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共同的战斗事业，他们生命的脉搏如何合二为一地在和谐跳动，——真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毁灭》从出版到现在，已整整半个世

纪。五十年来，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毁灭》和中国人民一同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穿过枪林弹雨，跨过黑暗年代，满怀胜利的喜悦，来到阳光灿烂的新中国。当年继“大江”和“三闲”版《毁灭》出世之后，这本里程碑式的战斗小说便很快流传。其后曾一再被翻印重版。1938年6月鲁迅纪念委员会将《毁灭》与鲁迅所译的《十月》（苏、A·雅各武莱夫）、《山民牧唱》（西班牙、P·巴罗哈）、《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俄、契诃夫）等三种小说一并收入《鲁迅全集》第十八卷出版；同时又出版了《毁灭》的单行本，虽然仍用大江版封面，但译者署名却一律改转。有同志曾撰文回忆抗战时期，许多战士如遇包围，进行生死搏斗时，身边携带的一切都可抛弃，唯有革命的书和枪，或冲出重围将其带走，或与自己生命一同毁灭；与这些战士的生命结成三位一体的革命书籍中，就有毛主席的著作、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非摩维支的《铁流》等等。

鲁迅当年也曾对友人说：“国民党怕毁灭，所以连我译的《毁灭》，也不准书店代售。其实，《毁灭》是禁止不了的，国民党的毁灭，也是避免不了的。”鲁迅的伟大预言实现了。1949年10月新中国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光荣地诞生了。《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也率领苏联文化代表团，参加我们的开国

大典。当时他曾非常激动地一再对中国朋友说：“我的小说《毁灭》，蒙我最崇敬的世界伟大作家鲁迅先生亲笔翻译，我终身感到莫大的荣幸！”

解放后《毁灭》在全国城乡各地普遍发行流传，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将鲁迅所译《毁灭》接二连三地多次再版刊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还于1959年8月出版了蒙文版。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8月又印行了由磊然同志从俄文直接译出的新版《毁灭》由于俄文原版、法捷耶夫生前曾经作过重要修改，所以，这个全新译本对于我们研究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深入理解作品中的几个典型人物，颇有价值。

毛主席早在1942年，就曾十分精辟地讲过：“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对《毁灭》所作的高度评价，不仅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就像科学的预见那样，也为鲁迅所译《毁灭》，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流传的历史所完全证实了！

鲁迅的英名和他所译的名著《毁灭》，必将世代流传，永垂史册！